

# 中国省级财政支出外溢效应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张宇麟

摘要：本文通过 Case 等（1992）提出的空间经济学模型分析了我国 1994 年到 2006 年各省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我们构造了地理相邻权重、GDP 权重以及人口流动权重反映参照省份对目标省份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我国省级财政支出存在着明显的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主要源于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进一步对财政支出进行分类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主要使用经济建设支出而非公共服务支出参与 GDP 竞争，同时人口流动可以促使地方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基于研究中的发现，本文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方自主权的提高，我国地方财政支出规模迅速增长，至 2006 年达 30431.33 亿元，占到整个财政支出比重的 75%以上。在分析地方财政支出这种增长趋势时，人们通常只强调区域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以及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忽略了地方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是指某一地区财政支出变化对于其他地区财政支出的影响。这种效应意味着某一地区的财政支出不仅受到该地区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也会受到其他地区财政支出变化的影响。现实中，地方财政支出确实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例如 Baiker（2005）利用美国 1983 年—1992 年的各州财政支出数据发现一州的财政支出会因为相邻州增加一美元而相应增加一美元。就我国而言，财政分权体制和人口流动也有可能使得省级财政支出存在外溢效应。

在关于中国财政分权的讨论中，Blanchard 和 Shleifer（2001）指出，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财政分权是在政治集权的前提下进行的，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任免和升迁握有决定权。为了调动地方官员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中央政府一方面对于当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官员予以升职的激励，另一方面则对当地经济发展缓慢的地方官员予以降职或闲置的处罚。在这种强有力的政治激励下，地方官员展开了以 GDP 为指标的政绩竞争。Li 和 Zhou（2005）利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省级数据发现地方官员的升迁概率与本辖区内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证明了中国确实存在着“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周黎安，2007）。

由于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还能够提高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吸引流动资本，带动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地方官员为了在“晋升锦标赛”中胜出，就会大力增加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然而，这种做法很可能导致各个省份之间的 GDP 竞争传导到财政支出上，使得财政支出尤其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投资也产生竞争关系。比如，某一省份增加用于基本建设方面的支出，其他省份为了保持 GDP 竞争的优势，也会相应增加用于基本建设方面的支出。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省级财政支出存在竞争的直观证据。

例如，某省的财政厅负责人在阐述该省的财政支出政策时说道：“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的热潮将因投资规模、投资效率的差异使各省市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重新排序，我们必须准确、快捷地把握这一机遇<sup>1</sup>”。

在考虑财政分权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人口流动对于中国省级财政支出的影响。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跨省的流动人口达到4200多万。庞大的流动人口具有两个特征。一是非对称性流动。中国的人口流动一般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发达的东部地区，较少出现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流动的现象。二是流动人口很难在流入地获得当地户籍。由于没有户籍，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到流入地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但是，随着国家对民生问题的重视，这一状况近年来有所改善。从03年开始，北京、上海、广东等东部省市相继将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纳入财政保障。同时，流入地的户籍管理政策有所松动，流动人口逐渐可以享受部分公共服务和福利。

在这种情况下，庞大的流动人口对各省的财政支出尤其是中西部这些人口净流出省份的财政支出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根据“用脚投票”的蒂伯特模型（Tiebout, 1956），地方政府会努力改善公共服务以吸引居民迁入，因此我们推测中国目前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可能会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产生两种效应。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服务支出会随着东部地区公共服务支出的提高而提高，努力防止人口流失，另一方面，如果人口流失过多，中西部地区则会丧失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东部地区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中西部地区反而会降低这方面的支出，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但是，在实际中何种效应起着决定作用，还必须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目的在于检验中国省级财政支出外溢效应是否存在及其大小，同时探讨GDP竞争和人口流动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介绍；第三部分提出计量模型并说明分析的变量；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 二、文献综述

传统文献中关于财政支出外溢效应的研究主要是置于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竞争的框架中进行讨论，并且侧重于讨论这种外溢效应的影响。Oates (1972) 指出财政支出外溢效应的存在会导致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偏离，从而只能产生“次优”的结果。Wildasin (1988) 根据纳什均衡讨论了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的效果。他发现财政支出的增加不仅导致本地区的税率提高，而且会引发资本外流，使得相邻地区可以以较低的税率提供较高水平的公共物品。同样，地区税率的增加也会引发资本外流，扩大相邻地区的税基，使得相邻地区可以以不变的税率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由于投资于基础设施的财政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与税收竞争导致“奔向底部 (race to the bottom)”不同，Michael 和 Marchand (1996) 认为财政支出的竞争往往使得用于经济增长的财政支出过多，而用于其他诸如福利和环境保

<sup>1</sup> 王加林，(1998)

护方面的支出则显不足。Gordon 和 Wilson (2001) 认为这种财政支出竞争也会减少政府官员对财政资源的浪费, 提高居民的效用。Bucovetsky (2005) 证明了随着要素流动性程度的提高, 用于经济增长的财政支出竞争会日益加剧, 最终导致基础设施投资过度。

传统文献中只是简单假定财政支出外溢效应存在而不予以证明的做法难免受到人们的质疑。因此, 随着空间计量方法的出现, 经济学家们开始对外溢效应是否存在进行实证分析。Case 等 (1992)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了美国本土各州 1970 年到 1985 年的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 发现目标州财政支出中 70% 的部分都可以由相邻州的支出增长所解释, 这里的“相邻”不仅指地理意义上的毗邻, 还包括两州在人均收入、黑人所占比例上的相近。由于黑人所占百分比在统计上最为显著, 因此他们认为黑人所占的比例越接近, 两个州之间的财政支出相关性也就越高。Baiker (2005) 利用 1983 年到 1992 年的数据进行了重新的估计, 发现一州财政支出的 90% 都可以由外溢效应所解释, 并且人口流动是决定财政支出外溢效应的主要因素。Albert (2006) 对西班牙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分析时还考虑了公共物品的提供成本, 发现一个地区财政支出增加会使相邻地区受益, 从而引起相邻地区财政支出的减少。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选民并不了解本州出台的一些公共支出项目的真实成本, 因此他们可能会根据其他州是否出台相同的政策作为判断标准, 这被 Besley 和 Case (1995) 称为“标尺竞争 (yardstick competition)”。另外, 州与州之间可能由于担心较高的福利政策会引发净纳税者的流出和净福利者的涌进, 因此在决定福利支出时也会参照其他州的标准。Saavedra (2000) 和 Wheaton (2000) 均从实证研究中发现美国各州之间存在类似的福利竞争, Figlio 等 (1999) 还发现一个州削减本地的福利支出比增加福利支出对其他州的影响更大。

### 三、模型与数据

由于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必须考虑空间上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因此, 我们应用 Case 等 (1992) 提出的空间计量模型:

$$E_{it} = \phi W \bar{E}_t + X_{it} \beta + f_i + h_t + u_{it} \quad (1)$$

其中  $E_{it}$  表示第  $i$  个省在  $t$  时的财政支出, 这里我们称为“目标省”。 $\bar{E}_t$  表示  $t$  时除了第  $i$  个省之外的其他省的财政支出, 我们称之为“参照省”。

$\phi$  是反映财政支出外溢效应的估计系数, 因而是我们在研究中首要关注的对象。如果  $\phi$  值为零或者  $\phi$  值不显著, 就表明省级财政支出不具有外溢效应; 如果  $\phi$  值为正, 那么省级财政支出呈现正的外溢效应, 省与省的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如果  $\phi$  值为负, 那么省级财政支出呈现负的外溢效应, 省与省的财政支出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W$  表示参照省份对目标省份财政支出影响程度的权重矩阵。显然, 不同的参照省份对目

标省份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由于公共物品的外溢效应发生在相邻区域内，所以相邻省份的财政支出之间可能存在互补效应。同时，在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下，有可能 GDP 越相近的省份之间财政支出的相关性就越高。另外，根据“蒂伯特模型”，人口流出省与人口流入省之间的财政支出也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因此，在设定权重矩阵  $W$  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实际的空间距离，也要考虑虚拟的“经济距离”和人口流动造成的影响。根据 Baiker (2005) 我们可以设定以下三种类型的权重矩阵：

1、地理相邻权重  $W^G$ ：  $w_{ij} = 1/S_i$ ，  $S_i$  为与目标省具有共同边界的参照省份个数，如果参照省份与目标省具有共同边界，那么参照省份就被赋值为  $1/S_i$ ，否则为零。在这种权重定义下，凡是与目标省份具有共同边界的参照省份对目标省份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都是相同的。

2、GDP 权重  $W^I$ ：  $w_{ij} = \frac{1}{|gdp_i - gdp_j| S_i}$ ，  $gdp_i$  表示目标省的 GDP，  $gdp_j$  表示第  $j$  个参照省份的 GDP，  $S_i = \sum_j \frac{1}{|gdp_i - gdp_j|}$ ，表示目标省与各个参照省份 GDP 距离的倒数之和。其中各省的 GDP 采用样本期的平均值。这种设定方式意味着参照省份的 GDP 与目标省份越接近，那么它对目标省财政支出的影响程度也就越大。

3、人口流动权重  $W^M$ ：  $w_{ij} = \frac{res_{ij}}{\sum_{j=1}^k res_{ij}}$ ，  $res_{ij}$  表示流入第  $j$  个省而户口在第  $i$  个省的流动人口，  $\sum_{j=1}^k res_{ij}$  表示第  $i$  个省流出的所有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由于中国当前的人口流动呈现出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入的非对称性特征，因此这里我们并不考虑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口的内部流动，而是计算出中西部流入东部地区的净人口并将其作为权重。这样，我们就可以考察人口流动对于中西部省份财政支出的影响。为了防止权重矩阵存在内生问题，在应用人口流动权重时，数据样本期从 2001 年开始。

$X_{it}$  是影响财政支出的一系列外生变量。在本文中，我们引进了包括 GDP，15 岁以下人口比重，65 岁以上人口比重，人口密度，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在总职工人数中的比重作为外生变量。GDP 决定着一个省的财政支出水平，一省的 GDP 越高，相应的财政支出水平也就越高。15 岁以下人口比重，65 岁以上人口比重反映了一省用于社会保障、教育方面的支出。人口密度变量用于控制人口数量对于地区财政支出的影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反映了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般也会使政府增加公共物品的

提供。同时,为了捕捉体制变革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我们依照傅勇和张晏(2007)的做法,用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在总职工人数中的比重刻画中国的体制改革进程。

另外,地区财政支出还会受到一些无法量化的地区特征影响,比如季节状况和政治领导人的偏好。同时,经济周期的变化以及一些特定的时间因素也会对财政支出产生影响。为了控制这些因素,我们引入地区虚拟变量  $f_i$  和年度虚拟变量  $h_t$  分别反映地区特征和年度变化。

$u_{it}$  表示随机残差。如果模型中忽略了某些影响财政支出的变量,并且这些变量本身具有空间相关性,那么  $u_{it}$  就会存在空间相关性:

$$u_{it} = \lambda W u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此时,  $\varepsilon_{it}$  服从独立正态分布。在估计中,如果忽略残差的空间相关性,可能会导致错误估计  $\phi$  值。例如,如果实际上  $\phi$  值为零,而  $\lambda$  值不为零,但由于在估计中忽略了残差的空间相关性,就会使得残差项的空间相关性反映到  $\phi$  值上,导致错误估计  $\phi$  值不为零(Brueckner 和 Saavedra, 2001)。因此,在估型模型(1)之前我们首先利用 LM 统计量(Anselin, 1988)检验模型(1)的残差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如果残差存在空间相关性,那么我们会将模型(1)和(2)一同估计,得出  $\phi$  值;如果残差不存在空间相关性,那么我们会单独估计模型(1),得出  $\phi$  值。

本文样本期间从 1994 年到 2006 年。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1997 年重庆从四川分离,成立直辖市。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我们将重庆和四川合并,CPI 指数取二者的平均值。由于西藏自治区缺乏 1995 年的 CPI 指数,所以样本中不包括西藏。各省的 GDP、15 岁以下人口比重、65 岁以上人口比重、人口密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财政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城市人口比重、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在总职工人数中的比重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其中部分省份的城市人口数据缺失,我们使用非农业人口代替。流动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模型的估计和检验在 matlab7.0 的环境下完成。

#### 四、 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

在分析各省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时,各个省的财政支出是同时决定的,这使得模型中的财政支出变量存在内生性。使用传统的最小二乘法将会得出有偏、不一致的估计量。所以,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表 1 是省级财政支出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其中人口流动权重采用的是 2001 年以后的样本数据。

表 1 中国省级财政支出外溢效应的分析结果

权重	$W^G$	$W^I$	$W^M$
LM 统计量	0.69 <sup>a</sup>	57.32 <sup>b</sup>	0.52 <sup>a</sup>
$\phi$	-0.26* (-9.96)	0.31* (4.53)	0.10* (4.15)
GDP	0.10* (46.63)	0.07* (12.40)	0.10* (27.62)
15 岁以下人口比重	4.30** (2.03)	6.39* (3.07)	5.22 (1.58)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	3.00 (0.67)	13.87* (3.04)	8.71*** (1.73)
人口密度	0.68* (13.74)	0.57* (11.68)	1.13* (10.10)
国有企业职工比重	2.41* (3.47)	1.66** (2.18)	4.05* (3.60)
城市人口比重	2.37* (6.57)	2.86* (7.42)	26.17** (2.56)
$R^2$	0.98	0.98	0.99

注：括号中是 t 统计量，上标 a 表示模型残差不存在空间相关性，上标 b 表示模型残差存在空间相关性。上标\*、\*\*和\*\*\*分别表示模型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我们从表 1 中发现，无论是采用  $W^G$ 、 $W^I$  还是  $W^M$ ，权重矩阵系数  $\phi$  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我国省级财政支出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外溢效应。同时，三个模型的  $R^2$  都在 98%以上，这说明模型的拟合度非常高，我们所考虑的变量能够较强地解释财政支出的变化。

地理相邻权重  $W^G$  的  $\phi$  值为 -0.26，表明相邻省份的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相互补充的关系。这与 Case 等（1992）和 Albert（2006）的发现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相邻地区财政支出存在互补的原因在于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相邻省份的人们更容易享受到对方提供的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另外，一省用于环境保护的支出会使相邻省份的环境状况得到改善，电视广播支出带来的收益也会超出一省的行政边界。同时，由于相邻省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非常频繁，所以一省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支出也会使相邻省份获益。

GDP 权重  $W^I$  的  $\phi$  值为 0.31，意味着与目标省份 GDP 相近的参照省财政支出增加 1 元，会使目标省份的财政支出也相应增加 0.31 元。与其他两个权重相比较，GDP 权重  $W^I$  的系数值最大，说明目标省对于 GDP 与其相近的参照省财政支出的变化最为敏感。这一发现从经验上证明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支出竞争。我们认为这种支出竞争的根源在于地方官员的

晋升锦标赛。由于中央政府的政治激励，地方官员展开了以 GDP 为绩效的竞争。作为对于 GDP 竞争的反应，地方政府在决定财政支出时，不仅会考虑本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也会参照 GDP 与自己相近的省份的财政支出，随着这些省份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竞争发生在 GDP 相近的省份之间也说明了中央政府是以相对绩效为考核目标，即地方政府只要在与自己 GDP 相近的省份竞争中胜出即可获得中央政府的奖励。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将这些具有“先天差距”的地区按统一标准考核只会引起负面的激励效果，造成 Cai 和 Treisman(2005)所指出的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强化竞争而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放弃竞争的两极分化现象。因此，中央政府在进行考核时先将各个省份按照 GDP 水平进行分组，针对不同水平的省份制定相应的考核目标，这样就能够激励所有省份参加 GDP 竞争，反映在财政支出上即地方政府会根据 GDP 相近省份选择自身的支出水平。

人口流动权重  $W^M$  的  $\phi$  值为 0.10，表明蒂伯特模型的机制在中国也发生作用，大量人口流出确实会迫使中西部省份提高财政支出。但是，地方政府是否会提高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防止人口外流，还需要对财政支出进行分类的检验。

三个模型的外生变量系数没有显著差异。由于 GDP 权重的系数最为敏感，这里我们着重解释 GDP 权重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其中，GDP、15 岁以下人口比重、65 岁以上人口比重、人口密度增加都会显著提高财政支出水平；城市化进程也会促使政府增加财政支出；而以国有企业职工比重刻画的中国体制转轨则会降低政府的支出。这些外生变量估计结果都与理论预期一致。

为了进一步研究财政支出外溢效应的发生机制，我们将地方财政支出分为经济建设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两种类型分别进行考察。经济建设支出包括预算科目中的基本建设支出和城市维护建设费；公共服务支出包括预算科目中的文体广播费、教育事业费、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费支出以及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由于地理相邻权重没有显著的政策意义也不是分析的重点，我们在分类型的财政支出估计中只考虑 GDP 权重  $W^I$  和人口流动权重  $W^M$ 。这两种权重的样本期统一从 2001 年到 2006 年，以便于比较。表 2 列出了回归结果。

表2 分类型财政支出外溢效应的分析结果

项目	经济建设支出		公共服务支出	
	$W^I$	$W^M$	$W^I$	$W^M$
LM 统计量	65.44 <sup>b</sup>	1.36 <sup>a</sup>	0.01 <sup>a</sup>	0.36 <sup>a</sup>
$\phi$	0.39*	-0.03	0.04	0.10**
	(3.73)	(-0.60)	(0.04)	(2.07)
GDP	0.01*	0.02*	0.01*	0.01*
	(5.96)	(11.87)	(11.01)	(11.17)
15 岁以下人口比重	0.54	2.44**	1.12	0.96
	(0.65)	(2.21)	(1.06)	(0.93)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	0.45	1.06	3.31**	3.00***
	(0.33)	(0.63)	(2.09)	(1.90)
人口密度	0.46*	0.45*	0.10*	0.13*
	(15.93)	(12.00)	(3.16)	(3.64)
国有企业职工比重	1.66*	1.63*	0.51	0.39
	(5.27)	(4.32)	(0.15)	(1.09)
城市人口比重	0.15	0.02	-0.03	-0.02
	(1.07)	(0.10)	(-0.17)	(-0.18)
$R^2$	0.98	0.97	0.97	0.97

注：表中符号涵义与表 1 相同。

我们首先分析 GDP 权重  $W^I$ 。经济建设支出的权重系数为 0.39，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同时，公共服务支出的权重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地方政府主要使用经济建设支出而非公共服务支出参与 GDP 竞争。地方政府的这种选择是容易理解的。基本建设支出和城市维护建设费大都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直接而明显。相反，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虽然在长期内可以维持经济持续发展，但是短期内的增长效应并不明显。因此，地方政府自然会优先选择增加经济建设支出从而促进 GDP 的快速增长。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水平的迅速提高正是得益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模式（张军等，2007）。然而，面对地方政府之间的 GDP 竞争，经济建设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截然不同的反应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一方面，经济建设支出的非合作竞争会造成基础设施投资过度（Bucovetsky, 2005），引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支出竞争中公共服务支出的缺失最终会导致这方面支出的严重不足（Michael 和 Marchand, 1996）。从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就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尽管我国面临着众多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社会文教费所占比重却上升缓慢，从 03 年到 05 年每年增加不到 0.1 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经济建设费却居高不下，近年来一直维持在 27% 左右。

虽然省级公共服务支出对于 GDP 权重不敏感，跨省的人口流动却会对其造成影响。从

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服务支出的人口流动权重系数为0.1,尽管系数值不大,却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经济建设支出的人口流动权重系数并不显著。这就回答了我们在引言中的提问,即面临人口流出,中西部省份不会“破罐子破摔”,而是会努力提高自身的公共服务水平,缩小与东部省份的差距,防止人口的进一步外流。将这一结论与财政支出竞争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各个省份之间的GDP竞争会使得地方政府忽视公共服务支出,但是人口流动却可以有效的抑制这种支出结构上的偏向。随着户籍管理政策进一步放宽,中国越来越接近蒂伯特模型的标准假设,相信这种基于争夺流动人口的省级公共服务支出竞争效应还会进一步加大。

## 五、结论

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是研究地方财政时容易忽略的问题。实际上,由于财政分权和人口流动的因素,地方财政支出之间很可能存在相互影响。本文通过Case等(1992)提出的空间经济学模型分析了我国1994年到2006年各省财政支出的外溢效应。我们构造了地理相邻权重、GDP权重以及人口流动权重反映参照省份对目标省份的影响程度,对各省的财政支出进行了考察,得到的结论主要有:

第一,我国省级财政支出存在着明显的外溢效应。无论是采用地理相邻权重 $W^G$ 、GDP权重 $W^I$ 还是人口流动权重 $W^M$ ,权重矩阵系数 $\phi$ 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GDP权重 $W^I$ 的系数值为0.31,明显大于其他两个权重的系数。这说明目前影响省级财政支出外溢效应的主要因素是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地方官员为了在以GDP为绩效的“晋升锦标赛”中胜出,决定财政支出时往往会参照GDP与自己相近省份的财政支出,随着这些省份财政支出的增加而增加。

第二,地方政府主要使用经济建设支出而非公共服务支出参与GDP竞争。由于基本建设支出和城市维护建设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地方政府会优先选择增加这方面支出促进GDP的快速增长。尽管这种财政支出竞争模式有效地提高了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却会造成经济建设支出过多和公共服务支出不足,引发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

第三,人口流动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我们发现,面临人口流出,中西部省份不会“破罐子破摔”,而是会努力提高自身的公共服务水平,缩小与东部省份的差距,防止人口的进一步外流。这说明蒂伯特模型也适用于中国,人口流动会促使地方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抑制支出结构过度偏向于经济建设支出。

本文的结论对于我国当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我们的研究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支出过多而公共服务支出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同时,人口流动可以促使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因此,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改革以GDP为指标考核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增加公众对于政府公共服务的发言权,逐步建立“自下而上”的考核机制;另一方面,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尤其是

发达地区要放松对于流动人口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种种限制,使得蒂伯特模型“用脚投票”的效应在中国可以充分发挥。

## 参考文献

1.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2. 王加林:《地方财政跨世纪改革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张军、高远、傅勇、张弘:《中国为什么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4.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5. Albert, S. O., Expenditure spillovers and fiscal interaction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ocal governments in Spai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9, 2006, pp. 32-53.
6. Anselin, L., *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7. Baiker, K.,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state spend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2005, pp. 529-544.
8. Besley, T., and Case, A., Incumbent behavior: vote-seeking, tax-setting, and yard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 1995, pp. 25-45.
9. Blanchard, O. and Shleifer, A.,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NBER Working Paper 7616, 2000.
10. Brueckner, J. K. and Saavedra, L., Do local governments engage in strategic property-tax competition, *National Tax Journal* 54(2), 2001, pp. 203-209.
11. Bucovetsky, S., Public input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2005, pp. 1763-1787.
12. Cai, H., and Treisman, D., Does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Discipline Governments? Decentr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2005, pp. 817-830.
13. Case, A. C., Hines Jr., and Rosen, H. S., Budget spillovers and fiscal policy inter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52, 1992, pp. 285-307.
14. Figlio David, Van Koplin, and William Reid, Do states play welfare gam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6, 1999, pp. 437-454.
15. Gordon, R. H. and Wilson, J. D., Expenditure competition, NBER working paper 8189, 2001.
16. Keen, M and M. Marchand, fis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3, 1997, pp. 33-53.
17. Li, Hongbin, and Li-An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2005, pp. 1743-1762.
18. Saavedra, L., A model of welfare competition with evidence from AFDC,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7(2), 2000, pp. 248-279.
  19. Tiebout, C.,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 1956, pp. 416-424.
  20. W. E. Oates, *Fiscal Federalism*,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21. Wheaton, W., Decentralized welfare: will there be underprovis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35(2), 2000, pp. 229-240.
  22. Widasin, D., Nash-equilibria in models of fiscal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35, 1988, pp. 229-240.